

GUANGDONG
MERCHANTS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Y

明清

广东商人

著◎黄启臣 庞新平

广东经济出版社

明清广东商人

黄启臣 庞新平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广东商人/黄启臣, 庞新平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1.12

ISBN 7-80677-118-2

I. 明… II. ①黄…②庞… III. 商人—研究—广东省
明清时代 IV. F7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7988 号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张	15.5
字数	357 000 字
版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
印数	1~1 000 册
书号	ISBN 7-80677-118-2 / F·628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销售热线: 发行部 [020] 83794694 83790316 邮政编码: 510100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合群一马路 111 号省图批 107 号)

网址: www.sun-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商品、商业和商人的历史源远流长，举世公认。正如马克思所说：

商品交换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就开始了。在埃及，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也许是五千年；在巴比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也许是六千年；因此，价值规律已经在长达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时期内起支配作用。^①

我国的商品交换也不亚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据现在看到的文献记载，早在传说的“神农之时”，已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②。到了尧舜禹时代，各地方之间更是“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③。此记载虽然不能作为信史，但它却是与马克思所揭示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商品交换时代相伯仲。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商朝，出现了私有制，于是商业从农业和手工业中脱离出来，商品交换又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商人出现了。吴晗认为：故史称商朝。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日益繁盛，从而打破了“工商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01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 《易·系辞》下。

③ 《淮南子·齐俗训》。

官”的格局，一些诸侯国家实行保护商人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于是，社会上出现一批既精于经商又善于从政的商人如管仲、范蠡、吕不韦等。但秦国在统一中国前后，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①。西汉初年，承袭了秦代的抑商政策，但因此时正在努力实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为主要内容的重农政策，因此，抑商是大大放宽了。于是，出现了商业繁荣、商人活跃以及商人豪强势力迅速发展的局面，致使豪商特别是盐铁商人在经济上具有相当的垄断能力，隐然成为一股与汉王朝相抗衡的力量。汉武帝为抑制豪商势力，决定采取对商人重课财产税的“算缗”法。同时，实行盐铁国营的严格的“重农抑商”政策，企图将豪商势力一网打尽。

自从汉武帝实施强硬的“重农抑商”政策之后，历代王朝一直将其奉为圭臬加以推行。首先是对商人的社会地位加以压抑贬低。“士农工商”，商人列为四民之末，经商被斥为末业。其次是禁止和严格限制商人的经营活动：

第一，凡重要商品均由国家垄断经营，如盐铁由国家专卖，各种矿产品亦划归官营；有的本属民间产品如制茶、酿酒等也划入专卖之列，不许商人经营；有的虽然允许商人经营，但又课以重税。甚至连粮食也实行官价收买，压低粮价，实际上等于对农产品的掠夺。

第二，严禁国内多数商品出海与外国贸易。

第三，对运输商品的工具如舟、车等重课以财产税，以大减商人的经营运作手段。

第四，设立课税关卡，对商人通过的货物严加查验，

^①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

抽税或重罚，使商人见关色变，如赴汤蹈火。

第五，禁止农民离开家乡从事商品贩运，视离乡背土者为流民，逼迫农民返回农家耕田织布，以冀驱商归田。

“重农抑商”政策可谓天衣无缝。但是，如前述具有七千年历史的商品、商业和“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但是，他并不是自觉的革命者；相反，他与这个世界骨肉相连。中世纪的商人决不是个人主义者；他像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①。所以，它凭着自身固有的价值规律的活力，冲破“重农抑商”政策的罅隙，顽强地发展自己。特别是到了明朝中叶至清朝乾隆年间（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的世界历史重大转折时期，“亚洲大陆农耕世界东西两端封建国家的农本经济，……都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耕织结合之趋于分解，生产之转向商品化，经营、生产组织和所有制之探求新的形式或某种改变，以及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按各自的历史条件，多少不等地显示出旧制度统治力的松弛，显示出更新的转折或转折的动向。与这些变化相伴随，在变化较剧烈、较深刻的亚欧大陆西端，航海活动开始越出了沿海和内海的局限，飞跃为跨越大洋的、连接世界新旧大陆的远航。由此，基于农本经济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闭塞的状态，开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分散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01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历史”^①。于是，中国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传统的“抑商”政策有所削弱，商人空前活跃，商业资本积累雄厚，商业竞争相当激烈。结果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地区逐步形成了长途贩运商品的地域商人群体——商人集团（俗称商帮），其中名声显赫者有徽商、晋商、苏商、鲁商、闽商、秦商、粤商、洞庭商、龙游商等等。这些地域商人通过国内外长途贩运贸易贱买贵卖的商业经营，发财致富，拥有商业资本十万、百万、千万者，不乏其人，例如徽商汪廷璋“以盐筴起家……富至千万”；晋商“曹姓、贾姓富各至四五百万”；江苏“淮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广东大盐商李念德（1704～1798）数十万计。特别是广东十三行怡和行商伍秉（1769～1843）的资本达到2 600万银元，同文行商潘正炜（1791～1850）资本达1亿法郎。这些富商大贾，人数不少，资本雄厚，经商范围广及国内外，足迹遍天下。其中广东商人，因得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明清政府特许的开放对外贸易政策的眷顾，而更闻名世界。

正是因为明清时期商品、商业和商人资本的推动下，出现了社会经济繁荣期，史称“康乾盛世”，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的先进国家，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指出：

清朝从1644年到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从1661年到1796年是史称‘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

① 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第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贸易长期出超。^①

江总书记的这个论断是符合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事实的，是科学的。根据当时世界经济可以进行比较的农业生产中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人口增长率两项指标（因为当时还没有国民经济的 GDP 和 GNP 统计），“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在 19 世纪以前并不落后于西欧任何国家”^②。特别是得明清政府特许开放对外贸易政策优惠之广东省，经济发展更是后来居上，赶上和超过内地的经济水平，“不少府、州、县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已经超过江南五府而跃居第一位”^③。

基于以上对中国商品、商业和商人资本的认识，我们选择了明清时期闻名世界的广东商人为课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对广东商人崛起的背景、商人的类型和经营方式、商人的地缘和社会构成、商人的会馆公所、著名商人家族、商人的海外移民、商人资本的流向和商人的历史作用等作阐述和剖析，希冀让读者了解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历史轨迹、特点和作用；并以此为借鉴，更科学地认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阶段的商品、商业和商人资本的价值和功能，从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推动我国实现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本书合作撰写始于 1995 年，至 2001 年完成。在此期间，作者之一的黄启臣承蒙日本国大阪大学、吉备国际大学、神奈川大学的邀请，四次东渡日本访问、讲学，并受

① 《学习时报》2000 年 7 月 17 日第 1 版。

② 陈振汉：《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载《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③ 李 华：《明清时代广东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载《清史研究集》第 3 辑第 149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聘为大阪大学客座教授；又蒙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使作者得到到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神户、九州、广岛、长崎、日立等城市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去收集有关广东商人在日本经营活动的资料。1998年秋天，当书稿写作完成大半时，作者曾在大阪大学人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举办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作过报告，并聆听了滨岛敦俊、片山刚两位教授，太田出、沈中琦、柏桦三位博士的真知灼见，对我们完成和修改本书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本书付梓之际，我们谨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在日本各地收集资料过程中，得到东洋文库的山根幸夫、鹤见尚弘、松本明三教授，大阪大学川北稔教授，神奈川大学的大里浩秋教授，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夫马进、森时彦三教授，神户大学的安井三吉教授，关西大学的松浦章教授，九州大学的川胜守教授，神户学院大学的中村哲夫教授，名古屋大学的森正夫教授、广岛大学的材木和雄教授、吉备国际大学的万成博教授、柳原佳子教授的大力帮助，在此，我们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为我们借阅有关图书、档案和提供图片的中国和日本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它们是：中国的北京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广西图书馆、佛山市档案馆、中山市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日本国的东京东洋文库、大阪大学图书馆、大阪市立图书馆、大阪市立博物馆、关西大学图书馆、神户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名古屋大学图书馆、广岛大学图书馆、九州大学图书馆、长崎市立图书馆、长崎市立档案馆、长崎市立博物馆等。

本书写作历时五载有余，在此期间，虽然我们有机会

四次（1995～1998）在大阪聚首，相互琢磨切磋，并交换手稿修改润色，力求提高本书水平。但由于我们才疏学浅，本书不尽人意的地方甚至是纰缪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恳祈读者批评指正。

黄启臣 庞新平 谨识

2001年8月1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广东商人崛起的人文地理环境与社会背景.....	1
第一节 优越的人文地理环境.....	1
第二节 商品性农业的普遍发展.....	7
第三节 手工业生产的长足发展	16
第四节 明清政府对广东实行开放对外贸易政策 ...	29
第五节 西方殖民国家先渐广东	33
第六节 悠久的商业传统与浓烈的商品意识	35
第七节 人多田少之驱动	38
第二章 广东商人的类型及其经营方式	40
第一节 商人的类型	40
一、牙商	40
二、盐商	55
三、米商	63
四、铁商	70
五、糖商	72
六、丝绸商	76
七、茶商	79
八、陶瓷商	84

九、珠宝商	87
十、船舶商	88
十一、典当商	88
十二、银铺商	102
第二节 商人的资本构成及经营方式	115
第三章 广东商人的地缘和社会构成	121
第一节 地缘构成	121
第二节 社会构成	157
第四章 广东商人的会馆公所	169
第一节 会馆公所发展的进程	169
第二节 会馆公所的内部结构与运作	225
第三节 会馆公所的功能	239
第五章 广东著名商人家族	250
第一节 南海商人颜亮洲	250
第二节 番禺商人潘启	259
第三节 南海商人伍国莹	270
第四节 新会商人卢观恒	287
第五节 番禺商人梁经国	300
第六节 广州商人冯柏燎	323
第六章 广东商人的海外移民	337
第一节 商人海外移民的轨迹	337
第二节 商人海外移民的驱动机制	370
第七章 广东商人资本的流向	378
第一节 产业资本	378

第二节	土地资本·····	391
第三节	高利贷资本·····	403
第四节	官吏资本·····	406
第五节	宗族资产·····	409
第八章	广东商人的历史作用·····	414
第一节	推动贸易市场网络的扩大·····	415
第二节	刺激货币经济的增长·····	423
第三节	导引近代工业的兴起·····	430
第四节	促进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433
第五节	促进城市和圩镇经济的发展·····	441
第六节	促进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448
第七节	帮助和加速外国经济的开发和发展·····	464
主要参考书目 ·····		474
后 记 ·····		481

第一章

广东商人崛起的 人文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

广东商人于明清时期崛起，并形成成为称雄逐鹿于海内外商界的商帮，决不是偶然的。它与广东具有优越的人文地理环境、发达的商品性农业、手工业生产、人多田少的矛盾、同西方国家接触早以及朝廷给予的对外开放贸易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商人的活跃与否是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商业环境、商品意识、市场网络、政府的政策、社会生产状况、自然条件等等因素的。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崛起和形成商帮也是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制约。明朝中后期以降，上述因素就有了一个明显有利于广东商人发展和活跃的趋势，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更是如此。因此，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崛起和形成商帮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一节 优越的人文地理环境

广东是中国最南部的一个海洋省份，背负五岭，东、西、南三面临海，境内河网密布，无论是通向海外或省外，还是通向省内各地，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广东拥有长达 4451 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占全国大陆海岸线总长的五分之一，居全国首位。广东南临南海，南海岛屿星罗棋布，沿海多良港海湾，地当太平洋、印度洋、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海上航路的要冲，是世界上海洋航运繁忙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与世界海上交往的枢纽。从广东省会广州出发，西行到印度洋，可通西亚、北非和南欧各国；南行直达东南亚各国，过太平洋可抵达美洲诸国。广州至亚丁港海路相距 9 826 海里，比之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相距最近。因此，从西汉武帝中期（公元前 110 ~ 87），就开辟了自徐闻、合浦出海的“海上丝绸之路”。至三国吴黄武五年（公元 226）后，又确立了以广州为启航港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时期，以广州港始发的“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环球贸易的鼎盛阶段，对外贸易蓬勃发展。

广东省始终拥有著名的港口广州港，其港口航道具有水位较深、流量大、不淤浅的优良自然条件。广州港是近海的河口港，港口建于珠江岸边，距珠江海口 80 海里。由于广东雨量充沛，使珠江流域的平均每秒流量达到 36.59 立方米，仅次于长江而超过黄河 7 倍以上。平均径流量为每秒 25.9 立方米，仅次于闽江（34.1 立方米/秒），而约为长江每秒 17.5 立方米的 1.5 倍，或黑龙江每秒 5.3 立方米的 5 倍，以及黄河每秒 2.0 立方米的 13 倍。这就说明，珠江常年保持很高的水位，大大有利于广东的出海航运。同时，广东具有因石灰岩地质而使潜流得到过滤的特点，还有温暖的气候条件，各种植物生长期长，土地裸露面时间短、面积小、植被率高，从而使得珠江水系的含沙量少，如西江每年平均含沙量仅有 0.00 003 %（梧州）、北江为 0.00 046 %（清远）、东江为 0.023 %（河源）。这就为广州港及其航道提供了一个水量足、水位高、淤积浅的优越自然条件。在广州港到南海的 80 海里航道

上，一般水深7米，潮汐期水位更高，经过整治疏浚，吃水30英尺的货轮可乘潮驶入黄埔港区。无论是广州市内的白鹅潭还是黄埔港区，2000多年来从未发生过淤港或航线改道的现象。这就使广州成为中西交通的重要港口而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港之一，并且历久不衰。纵观中国港口的历史，不少港口正是由于缺乏像广州港这种自然条件而衰落的。例如泉州港，唐代时，它与广州、杭州、交趾（今越南北部）并列为中国四大港市，而且到了元代曾一跃压倒广州港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但至明清时期，泉州港却走向衰落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晋江的地壳隆起，河床升高，流域区内水土流失过大，使河流含沙量高达年平均0.034%样，大量泥沙充斥泉州港口，结果港口急剧淤浅，进而失去航行之利。于是到了明清时期，广州又恢复了全国海外贸易第一大港的地位。而泉州港却一蹶不振了。

同时，广东省境内河网交错，以西、北、东三江为主流的珠江水系贯串全省各地，并与全国各省沟通，内河航运与水陆联运交通十分便利，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内河交通网络。明清时期，全省有大小通航河流1343条，通航总里程达18377公里，设置航标里程4029公里，内设航标共4066座。其中有四条水路沟通全省以至全国各地，为广东商人的崛起和活动提供极为有利的生财之道。

第一条：北路

自广州出发，沿北江（全长460公里）而上，经南海县的官窑、三水县的西南、胥江，韶关的芙蓉、平埔，南雄县的湖口、黄坑等地，然后接上陆路交通的北路，跨过大庾岭，经东北到达江西；往西北通湖广（今湖南、湖北）。经过北江的水陆联运，广东的商品可北运到内地各省区，而外省区的货物也可经此航线源源不绝地南运入广

东。随着南北交往的频繁和贸易的发展，入明以后，广东参议王溥于洪武年间（1368～1398）亲临大庾岭视察，命令地方官吏调集人力，凿石填涧，修理桥梁，还“教民造车”^①，进一步发展手推车等运输工具。永乐初年，海外诸国的贡品也是先从广州经水路运至南雄，然后由大庾岭陆运至江西南安府（今江西大庾县）。成化初年，南雄县除了重修太平桥外，又扩建通济镇，增“屋百二十楹，居停客货”^②。正统初年，南雄知府郑述又主持重砌岭路45公里，在路旁增植松梅。嘉靖年间（1522～1566），在距南雄府治35公里与江西南安的交界处，建置中站城，便于来往广东的货物屯聚。在这条商路上，出现了“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残履，冬无寒土”的繁忙景象。容闳在其《西学东渐记》一书中曾说到湖南湘潭与广东之间“商务异常繁盛，劳动工人肩货来往于岭南者不下十万人”。可见，北路是广东商货输往外省和外省商货输入广东最多的一条商路，而南雄也就成为南北商货贸易的中转站。南雄镇有个名叫葛盛华的商人，就雇有40个人经营生意^③。而且明清朝廷规定，北江为“贡使通道”，即外国商品到达广州后，沿北江上韶关，再沿连江过南风坳，下春陵水入湘江，到湘潭再分发到内地；而各路丝茶货物也先在湘潭装箱，再沿北江南下广州放洋。

第二条：西路。

自广州出发，逆西江（全长2200公里）而上，经三水县、高要县、德庆县、封开县，然后经江口埠，进入广西，再经浔江、桂江北上广西柳州、桂林，再通过灵浔与

① 郝玉麟、鲁曾煜：《雍正广东通志》卷四。

② 梁弘勋、胡定：《乾隆南雄府志》卷十九。

③ 利玛窦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6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